

元结诗解

聂文郁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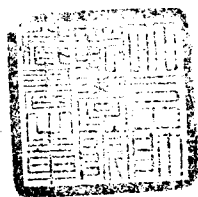
元 结 诗 解

聂文郁 注解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0745



陕西人民出版社

1010745

元结诗解

聂文郁 注解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95,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统一书号: 10094·447 定价: 1.60元

D175461

目 录

写在前面	(1)
论诗人元结的世界观	(3)
试论元结诗的艺术形式	(36)
诗篇注解	(55)
补乐歌十首 (有序)	(55)
网罟	(57)
丰年	(59)
云门	(60)
九渊	(62)
五茎	(64)
六英	(66)
咸池	(67)
大韶	(69)
大夏	(71)
大濩	(73)
二风诗 (有序)	(75)
治风诗五篇	(77)
至仁篇	(77)
至慈篇	(78)
至劳篇	(80)
至正篇	(82)
至理篇	(83)
乱风诗五篇	(85)
至荒篇	(85)

至乱篇·····	(86)
至虐篇·····	(88)
至惑篇·····	(90)
至伤篇·····	(91)
引极三首 (有序) ·····	(93)
思元极·····	(94)
望仙府·····	(96)
怀潜君·····	(98)
演兴四首 (有序) ·····	(99)
招太灵·····	(101)
初祀·····	(103)
讼木魅·····	(106)
闵岭中·····	(111)
闵荒诗 (有序) ·····	(116)
系乐府十二首 (并序) ·····	(122)
思太古·····	(123)
陇上叹·····	(125)
颂东夷·····	(127)
贱士吟·····	(129)
歛乃曲·····	(131)
贫妇词·····	(133)
去乡悲·····	(135)
寿翁兴·····	(137)
农臣怨·····	(139)
谢大龟·····	(141)
古遗叹·····	(143)
下客谣·····	(145)
石宫四咏 ·····	(147)
与党评事 (有序) ·····	(151)
与党侍御 (有序) ·····	(154)
寄源休 (有序) ·····	(157)

与瀼溪邻里（有序）	（161）
喻瀼溪乡旧游	（164）
忝官引	（166）
樊上漫作	（171）
酬裴云客	（173）
漫问相里黄州	（175）
雪中怀孟武昌	（177）
喻常吾直	（179）
招孟武昌（有序）	（181）
漫歌八曲（有序）	（184）
故城东	（185）
西阳城	（187）
大回中	（187）
小回中	（188）
将牛何处去二首	（189）
将船何处去二首	（190）
酬孟武昌苦雪	（192）
漫酬贾沔州（有序）	（195）
登殊亭作	（199）
喻旧部曲	（201）
春陵行（有序）	（202）
贼退示官吏（有序）	（208）
宿无为观	（211）
无为洞口作	（212）
登九疑第二峰	（213）
刘侍御月夜宴会（并序）	（214）
题孟中丞茅阁	（218）
别何员外	（220）
送孟校书往南海（并序）	（223）

招陶别驾家阳华作	(226)
宿洄溪翁宅	(229)
说洄溪招退者	(230)
窠樽诗	(232)
朝阳岩下歌	(233)
游右溪劝学者	(235)
游谿泉示泉上学者	(237)
石鱼湖上作 (有序)	(238)
宴湖上亭作	(240)
引东泉作	(242)
登白云亭	(243)
谿阳亭作 (有序)	(245)
夜宴石鱼湖作	(247)
石鱼湖上醉歌 (有序)	(248)
宿丹崖翁宅	(250)
欸乃曲五首 (有序)	(252)
橘井	(256)

附录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	
(有序)	(259)
元结传	(262)
元次山事迹简谱	(266)
历代诗文评摘要	(275)

写在前面

《元结诗解》主要是供给古典诗歌的初学者读的，注解比较详细浅显。

唐代诗人元结撰写过不少的诗文。《新唐书·艺文三》的儒家类载有《元子》十卷、《浪说》七篇、《漫说》七篇，小说家类载有《猗犴子》一卷，《艺文四》的别集类载有《元结文编》十卷。但这些著作，今皆不存（今集中有题名为《漫论》者，也只一篇，当不是《新唐书》所说的《漫说》七篇）。

元结三十五岁时，也就是天宝十二载，因举进士入京，有司要“考校旧文”，曾自辑《文编》，纳于有司。大历二年，元结四十九岁在道州任内时，又把近十五年来所作诗文，予以次第，加入旧编，计二百零三首，分为十卷，仍名之为《文编》，并自序。《新唐书·艺文四》所载《元结文编》十卷，应指此书。今书已不存，只存《文编序》。

今所传《元次山集》是后人摭拾散佚而成的。四部丛刊本或四部备要本，所据皆明正德丁丑刊十卷本。此十卷本系明湛若水校、郭勋编，并附拾遗一卷。

《元次山集》编诗约三卷，《全唐诗》元结卷编诗二卷，两书编次各异。《元结诗解》的编次，与两书无一相同，它是完全依照孙望先生的校本编次的。《元次山集》与《全唐诗》元结卷，皆有校勘，但校勘多不相同。孙望先生校本在两书校勘的基础上有所增补，较为完善；《元结诗解》悉依孙望先生校

本，未加增删，校勘文仍放在有关字句之下，保留原样，我们只就原校订处加括号以醒目。至于个别地方对孙望先生校订有不同看法，也只在注解或评介中说明。

元结诗今存者，包括王国维以为伪托的《橘井》一诗在内，共九十八首，《元结诗解》全部收录注解。其间良莠不齐，美丑有异，为了便于选读，不避浅陋，在评介中给予说明。

诗解分两部分：一为注解，一为评介。注解包括典实出处的注明，冷词僻字的解释，晦文难句的疏解等等。注解都放在序文或原诗之后，逐条标明号码。一条注解，有的只注一事，有的连注数事。评介具有一揽子性质，包括解题、提示、考订、评议等等，但主要评介诗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性。写作技巧对于正确表现诗作的思想内容，增强诗作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批判地借鉴前人艺术经验的最值得注意的一环。为此，在评介中我们特别重视写作技巧这一方面的分析与探讨。

《元结诗解》是据二十年前我的专题课教学讲义加工整理的。在加工整理中，已发现不少不妥之处，虽经改正，但我想不妥之处还很多，衷心希望读者不吝教益，予以批评指正。

戴文郁

1981.2.15

论诗人元结的世界观

(一)

元结，字次山，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卒于唐代宗（李豫）大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享年五十四岁。

元结生活的年代，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的年代。这个转衰与加剧的标志，应是李林甫入相一事。李林甫“擢黄门侍郎”、“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根据《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所载，是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五月。是年，元结为十六岁。唐制：“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这里所谓十六为中，盖取其童稚已过，开始入于懂事之年。元结在懂事之年，恰值李林甫入相，因而，李林甫入相之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民生等情况，对元结的思想成长具有极大的影响。元结虽在少年时“倜傥而不羁”（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但他在李林甫入相的次年，“折节向学”（《新唐书元结传》），开始有所振作了。元结这一变化，就使李林甫入相对他思想成长的影响更为加深了。

这里具体的问题是：李林甫入相之后，所谓“开元盛世”，究竟是继续“盛世”呢，还是由盛转衰了呢？我们的意见是后者。

首先，李林甫入相一事，就是政治腐败的一个集中表现。李林甫入相，曾使用若干阴毒卑鄙的手段。他一方面对内定入相的韩休通消息，卖弄人情，使韩休“甚德林甫，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旧唐书李林甫传》）；另一方面他勾结宦官和妃嫔，窥伺皇帝动静，使自己的奏对，事事迎合旨意，从而取得皇帝的信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更重要的一方面，他卖身投靠“宠幸倾后宫”的武惠妃，声言他尽力保护惠妃之子寿王，使“惠妃德之，阴为内助”（《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为了巩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不止一次地提及用人唯贤的问题。他说：“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之后，他不断见诸言行：贞观元年，他指责没有按所令尽心举贤才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三年，他对宰相重申“孜孜求士”之意，他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讎”；十三年他对桂州都督李宏节“以清慎闻”而身歿卖珠的问题，抚掌承认自己对此造次说话，不利于举贤；十五年他又对宰臣说：“致太平之用者，唯在得贤才”（以上均见《唐会要》卷五十三）。正是因为强调用人唯贤，所以唐初才起用了魏征、褚遂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出现了史家所谓的“贞观之治”。

下至开元初年，也是这样。元年，唐玄宗（李隆基）“颇德”姚崇，竟至先应“十事”可行，促其奉诏入相（《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注引）；四年，他又采纳黄门监卢怀慎以“明时重器”荐宋璟的话，不究愆失坐贬的事，立即拜宋璟入相（《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姚、宋的任用，与史家所谓“开元盛世”不能分开。

“贞观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都不是偶然的，这与封

建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用人唯贤的政治作风关系很大。而李林甫入相，却和用人唯贤背道而驰。显然，“开元盛世”已成过去。

其次，在农民问题上，李林甫入相之后，也倒行逆施起来。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唐玄宗幸东都（洛阳），召集宰相议还长安。裴耀卿、张九龄主张：“今农事未毕，请俟仲冬”。李林甫为了迎合上意，私下进言：“往来行幸，更何择时？”唐玄宗竟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即日西行”（《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是标志唐王朝对农民态度改变的一件大事。

唐帝国建立之后，封建统治阶级鉴于农民起义推翻隋王朝的教训，从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出发，曾经采取了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和措施。以李世民为例，在“遍封宗子”的问题上，他曾说：“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他“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在“止盗”问题上，他反对“重法以禁”，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良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在选吏问题上，他曾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他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在封禅问题上，他对臣下说：“卿辈皆以封禅为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后群臣犹请，他终以魏征“户口未复，仓廩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

劳费，未易任也”之言为是，而终止封禅（《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在外交问题上，他不接受康国（在葱岭附近）内附之请。他说：“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在兴修土木问题上，他曾“欲营一殿，材用已具”，而终于寢止。他对公卿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

此外，我们再谈一下唐初的均田制度和租庸调赋税法。《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曾说：“初定均田租庸调法：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十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绌、绢、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贞观之治”如此，“开元盛世”又何尝不然。开元元年，李隆基从姚崇“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之议，“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二年，御史弹奏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李隆基本着“不可纵舍”之意，做了处理，“由是贵戚束手”

（同上）。四年，山东蝗复大起，朝廷“又命捕之”，李隆基并“敕委使者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同上）。又四年，李隆基曾“遣宦官诣江南取鸂鶒、鸂鶒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烦扰”。他接受倪若水“今农桑方急”之谏，“纵散其鸟”（同上）。仅就以上几条，开

元初年，他仍然采取了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措施。

这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和措施，使一般农民有了耕地，保证了农业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安定了人民生活，巩固了封建秩序，形成一个经济上升的时期——“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而李林甫入相未久，就破坏了贞观和开元初年对农民让步的政策，不惜搅扰农事，满足统治者私欲。这种倒行逆施，说明“开元盛世”，已成过去。

第三，李林甫入相之后，封建统治阶级更进一步地追求奢侈淫靡的生活。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裴耀卿就指出：“贞观、永徽（唐高宗李治年号）之际，禄廩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瞻；”“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九）。奢侈淫靡，在李林甫入相前，已经很严重。从粮食消费看，如此；从军费供给看，也是如此。“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经过开元二十九个年头，“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百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因而，“公私劳顿，民始困苦”（《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更需一提的是，以李隆基和杨玉环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在李林甫入相之后，更肆无忌惮地奢侈淫靡起来。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后不久，就把他儿子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潜内宫中”，公开封为贵妃。自此杨氏一门，“宠贵赫然”，封官爵，起高第。不说别的，只说贵妃几件事：织绣工人“专供贵妃院”的，就有七百人。大臣供献贵妃“器服珍玩”，已成为升官进爵的捷径，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所献精美”，或加三品，或升为户部侍郎。贵妃喜吃生荔枝，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

贞观、开元的“盛时”，是坚决反对奢侈淫靡的。李世民刚即位就以“不敢纵欲”告侍臣。他说：“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为此，唐太宗终于使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同上）。

开元初，就此也有可称之处。二年，唐玄宗“以风俗奢靡”，一再敕令销毁金银器玩和珠玉锦绣、规定百官服饰、禁罢两京织锦坊（《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与此先后，他针对民间有“充掖庭”的“讹言”，“令有司具车牛于崇明门”，自选宫女，“裁还其家”（同上）。

我们不难理解“去奢省费”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而李林甫入相之后，一转此风为奢侈淫靡。这与贞观、甚至开元初年一再提倡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治国准则（《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大相径庭。“开元盛世”确已过去。

仅就以上三方面看，显然，李林甫的入相，正标志着唐帝国已经由盛转衰。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探讨元结的世界观及其作品是很重要的。元结从懂事之年开始，所能看到的就不是什么社会繁荣、经济上升的“盛世”局面，而是一个腐败下降、衰朽凋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没落局面。这个局面是天宝黑暗、安史战乱的序幕；这个局面对元结世界观、文学主张、以及创作活动都起着极大的影响。元结不满现实、抱有救国济民的政治理想、提出恢复风雅的文学主张，以及一开始创作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等等，都不是偶然的。这种思想倾向是从开元后期、从李林甫入相开始、从他懂事和“折节向学”之年起，就孕育发展起来。肯定这一点，我们对作者思

想、行事和作品，特别是早年的思想、行事和作品，就可以做正确而深刻的理解。

(二)

元结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后魏常山王遵的十二代孙。祖先本是鲜卑族，姓拓跋，后易姓为元。高祖善祿是唐尚书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是唐朝散大夫，褒信令，袭常山公；祖父亨是霍王府参军；父亲延祖是魏成主簿、延唐丞。

元结在《与吕相书》中曾提及他的家世：“某又三世单贫”。这里所谓“单贫”，应是相对之语。《新唐书元结传》叙及祖亨尝有“我承王公余烈”的话。这里“单贫”正对“我承王公余烈”的“王公”而言，就是说，从祖亨、父延祖到结上书之时，这三世都没有高官厚禄，比起祖先常山王、冯翊王、常山公来，确实“单贫”了一些。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家庭仍为伸手穿衣、张口吃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僚地主家庭。元结所以在少年时“倜傥不羁”，青年时“折节向学”，以后又两次往返京师，数年“习静于商余山”，以及安史之乱中“一身奉亲，奔走万里”等等，都是以这个官僚家庭为条件的。

就这个官僚地主家庭说，对元结做人处世、仕宦隐退、言论行为以及诗思文作等方面的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为他的父亲元延祖，一为他的从兄元德秀。

元延祖是一个不愿干时求进的人。《新唐书元结传》说他“逮长不仕”，说他“再调春陵（延唐）丞，辄弃官去”，说他“每灌畦掇薪，以为有生之役”。《元君表墓碑铭》说他的性格是“清静恬俭”，说他虽历微官，但“思闲，辄自引去”，

说他“以鲁县商余山多灵药，遂家焉。”但元延祖并不全然如此，他还有积极问世的一面。《新唐书元结传》记述他：“安禄山反，（元延祖）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可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云。”显然在这里，元延祖提出了面对现实、改造现实的问题，提出了问世行道的问题。

另外，元德秀更是一个有卓行的人。《新唐书》把他列入《卓行传》，《旧唐书》更专有《元德秀传》。对于元德秀，我们当然不从他事母、哺侄、居家安贫等方面来探究，我们只从他从政一事来叙述。《旧唐书》、《新唐书》以及李华《元鲁山墓碣铭》，都叙及他调任邢州南和尉时有“惠政”、“至行”，并以此有所升擢。至于他在鲁山令任内的惠政至行，就更有详细记载。《新唐书卓行传》：“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曰：彼诡计，且亡去，无乃为累乎？德秀曰：许之矣，不可负约，即有累，吾当坐，不及余人。明日，盗尸虎还，举县嗟叹。”又《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云：“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帅所部音乐集于楼下（五凤楼），各较胜负。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迁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芳。上曰：怀州之民，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德秀性介洁质朴，士大夫皆服其高”。又，后进皮日休有《七爱诗怀元鲁山德秀》曾云：“三年鲁山民，丰稔不暂饥；三年鲁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一室水蘂苦，四海声光飞。”（《全唐诗》卷六零八）。

元结在三十八岁以前，除短暂时间外，都奉侍在父亲元延祖的身边，因而父亲给他的家庭教育是长期的、深刻的。元结所以非待公车礼聘，不苟于仕宦；偏师救难，秉公按复冤狱